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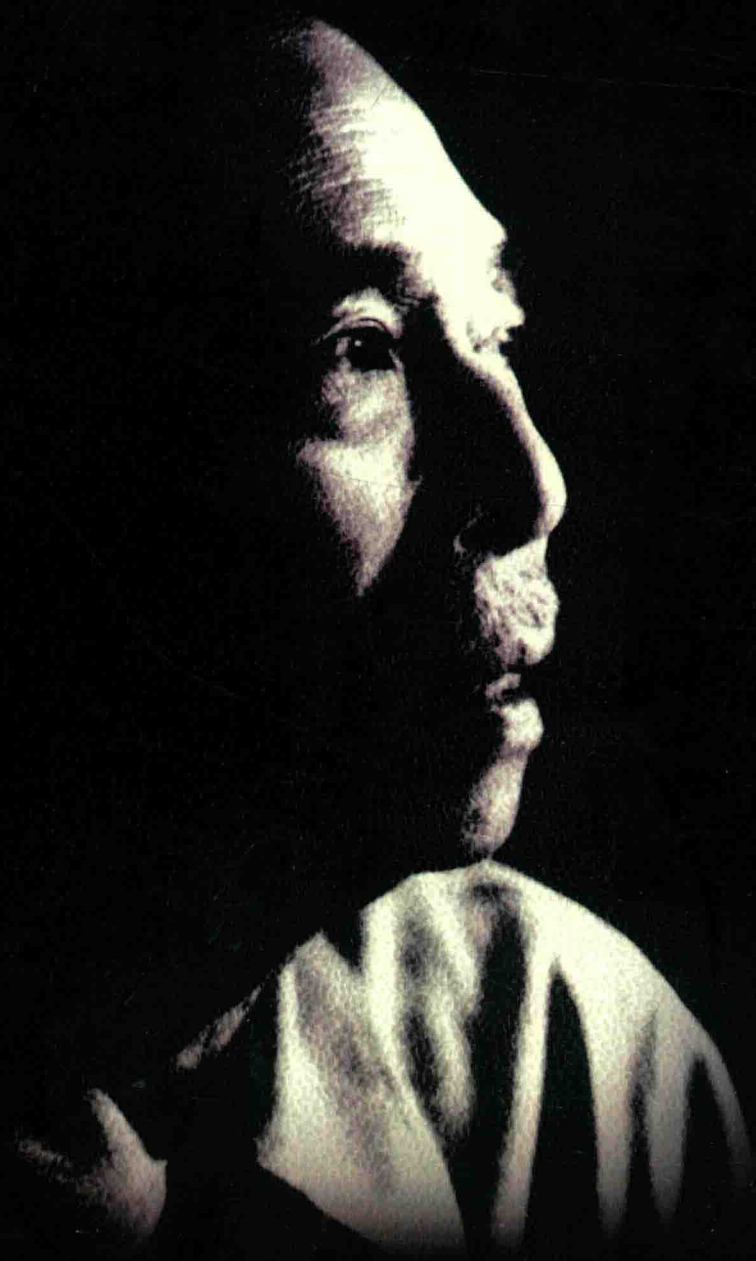
茅盾研究
八十年書系

錢振綱·鍾桂松◎主編

27

茅盾的藝術世界 (上)

丁爾綱◎著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茅盾研究
八十年書系



錢振綱·鍾桂松◎主編

丁爾綱◎著

27

茅盾的藝術世界 (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茅盾的藝術世界（上）／丁爾綱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序 4+ 目 2+198 面：19×26 公分

（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第 27 冊）

ISBN：978-986-322-717-5（精裝）

1. 沈德鴻 2. 中國小說 3. 文學評論

820.908

103010322

中國茅盾研究會《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編委會

主 編：錢振綱 鍾桂松

副主編：許建輝 王中忱 李 玲

特邀顧問：

邵伯周 孫中田 莊鍾慶 丁爾綱 萬樹玉 李 岫

王嘉良 李廣德 翟德耀 李庶長 高利克 唐金海

ISBN-978-986-322-717-5



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

第二七冊

ISBN：978-986-322-717-5

茅盾的藝術世界（上）

本書據青島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版重印

作 者 丁爾綱

主 編 錢振綱 鍾桂松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7 月

定 價 60 冊（精裝）新台幣 12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矛盾的藝術世界（上）

丁爾綱 著

作者簡介

丁爾綱，1933 年出生山東省龍口市。是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家。曾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當代文學研究會、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會、魯迅研究會、丁玲研究會理事、常務理事或副會長。茅盾研究會發起人之一，常務理事、副秘書長、顧問。出版論著：《丁爾綱新時期文論選集》（上、下）、《新時期文學思潮論》、《魯迅小說講話》、《山東當代作家論》（主編、主要作者）。茅盾研究論著有傳記系列：《茅盾評傳》、《茅盾翰墨人生八十秋》、《茅盾 孔德沚》、《茅盾人格》（合作）；作品研究系列：《茅盾作品淺論》、《茅盾散文欣賞》、《茅盾的藝術世界》。參與編輯 40 卷本的《茅盾全集》，任《茅盾全集》編輯室副主任，負責校勘、注釋第 11 卷、第 27 卷，是《全集》審定稿小組成員之一。主編、參考高校教材：《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下）、《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中、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講》、《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講》（上、下）、《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講》（上、下）。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數百篇。

提 要

《茅盾的藝術世界》是丁爾綱茅盾研究道路上從具體作品細讀向創作宏觀研究，面向茅盾整體研究過渡之轉型期的標誌性著作。搭建的原書專著框架，應社會需要把重點章節寫成論文形式先行發表。第三編「主題人物論」、第四編「典型提煉論」、第五編「結構藝術論」，填補了當時茅盾研究領域的空白。第六編「茅盾研究論」則是對當時國內外否定「五四」傳統、否定魯迅、否定茅盾的社會思潮的回答與反駁。開作者另一部論著《茅盾評傳》中茅盾研究史略縱線之先河。初步顯示出作者思辨型學術個性的矚目。

在内蒙古草原，我见过一种草；名叫飞来藤。无根，靠缠绕别的绿色的生命维系其萎黄的生存。在长白山，我见过一种松；宛如病梅，却比枝端还挺拔。在西藏，有一种扒地松；几乎无干，枝叶丛之蓬之，只抱着褐黄的山脉。

三十余载的论述生涯一下子被照亮了！我更加明白了什么是最佳的生态选择。

——丁东细

我的茅盾研究觀——代序

我接觸茅盾作品是 40 年代在故鄉膠東半島上小學和中學時期。由於當時中國的道路和中華民族的命運以及中國人民之命運的問題，是整個人民思考的中心；也由於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在膠東地區，中國共產黨領導山東人民正為此浴血奮戰；我個人也以少年而早熟的心靈感受著戰爭與土地改革運動血與火激蕩的時代氛圍。我父親抗戰初以生命與鮮血殉了中國人民爭生存、尋求主宰民族命運的壯麗事業。這殘酷的生活過早地把我推到政治漩渦中去。因此，對茅盾推出的宏觀反映革命時代，深刻展示中國人民命運前景的作品，我能有一定的理解，也產生強烈共鳴。全國解放以後，我有機會上了「五四」運動搖籃北京大學讀中文系。所以二年級開始就選中茅盾作為學習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突破口。1956 年 6 月在《處女地》上發表的我的處女作《試論茅盾的〈農村三部曲〉》，一開始就形成了我的個人經歷所決定的把政治和文學相互觀照的研究視角。我這大半生研究茅盾的這個特點的歷史成因，還是第一次公開說出。但這決非我個人身世經歷單一因素所致，最主要的還是研究對象：茅盾及其創作與文學活動本身的內蘊使然。

我很欽佩文學前輩張光年在紀念茅盾誕辰九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所選的標題：《文學家與革命家的完美結合》。這再精闢不過地概括出了茅公一生的基本特點。在過去，人們固然承認茅公是政治色彩很濃的作家，但一直到茅公臨終前開始發表他的長篇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完整地披露了茅盾建黨前夕加入共產主義小組，是中共第一批黨員，從事了長期的革命活動，再加上他逝世後中共中央作出決定，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黨齡從建黨之日算起，人們才開始承認茅盾是建黨元勳之一，他毫無愧色地可以列入老一輩

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行列。其實他入黨時間比周恩來、鄧小平還早。我黨許多早期活動家，如林伯渠、張太雷、張國燾等，都曾在他 20 年代主持中共上海兼區委員會及其下的國民運動委員會時期當過他的部下。連如今仍健在的德高望重的陳雲同志，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期間也曾是茅公主持「商務罷工」運動和任商務印書館臨時黨團負責人時的下屬的黨員。而茅盾早期從事的黨的活動、國共合作活動與馬克思主義譯介宣傳活動、領導和參與中國婦女運動與工人運動、「五卅」運動與北伐前夕的新聞宣傳活動、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政治活動、建國後任文化部長的領導工作以及從事世界和平運動等等，都說明他是革命家和文學家的完美結合。離開此，無法理解茅盾作品鮮明的政治傾向與時代精神。而且，茅盾在中國文化史上做出了多方面的貢獻。這一切不是文學研究框架所能包容的。我多次呼籲建立「茅盾學」研究學科，原因之一在此。

茅盾在中國現代文學史（1919～1949）和中國當代文學史（1949～）上，是唯一的一位能統貫全局、堪稱「執牛耳」的大文學家。魯迅過早地謝世。而茅盾在中國文學發展的這兩個重要歷史時期，以其理論批評、文學創作與文學活動的卓越建樹，毫無愧色地居駕馭全局地位。他對文學發展史特別是文藝運動史、文藝思潮史說來，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大家。他學貫中西，又把文學研究與借鑒的觸角伸向上下貫串三千多年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他的神話與先秦文學研究視野，又帶有索本求源的特徵。他是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史上現實文藝主潮的代表人物和領袖。他從倡導「為人生的藝術」始，到倡導與堅持「為無產階級的藝術」終，是一代宗師與泰斗。但他的創作又歷來以「開放性」為特徵。他廣收博採，剔糟取精；理論批評也視野開闊，廣泛介紹，舉凡人類文藝思潮史上的各種思潮流派，均在他的觀照與評介視野之中。他的小說創作，在革命現實主義潮流中，是開心理體驗型與社會剖析型、以及二者結合型的小說創作之先河的前驅者與奠基人之一。中國文學由「五四」的開放時期，到以 1942 年延安文藝整風、1950 年批判《武訓傳》、1960 年批判文藝上修正主義思潮為標界的三次大轉折，再到「文革」後新時期的規模幾乎超過「五四」的新的開放時期，茅盾有這一曲折進程的完整經歷。他在政治界、文學界的地位和他精通外語的優越條件等等，使他雖處「封閉期」而獨能保持開放性的個人文學視野。這使他在不同歷史時期，在創作特別是理論上能有許多超人的建樹。這也使他能長在長達六十五年的文

藝思潮史上起「執牛耳」的作用。

茅盾的文學道路可宏觀地概括為「三部曲」：即理論批評家——作家、理論批評家——理論批評家。儘管 1925 年～1927 年他以散文作家身份和其理論批評家交叉，建國後亦然；而且 1929 年～1949 年他是以理論批評家與作家雙重身份現身文壇；但總地說，上述「三部曲」大體上可以作為標示茅公文學歷史道路的總體公式。而這，多方面地體現了他的文學建樹。他以自己的文學史研究、理論研究和文學批評方面的多元的成果，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又在此不斷豐富發展的理論體系指導下從事創作。並把自己的豐富實踐經驗及廣泛借鑒別人的創作實踐經驗，作精闢的理論昇華，以充實與發展自己的理論體系。這就使他一身兩任，不論作為理論批評家和文學史家，還是作為作家，他都是被稱為「大家」而當之無愧的。一部四十卷的《茅盾全集》就是鐵證。在古今中外廣闊而漫長的文學史上，舉出這樣全面的文學家的名字是困難的；也只有如車爾尼雪夫斯基、魯迅這樣的名字，能列入這莊嚴的名單中去。

基於上述的宏觀理解，我的茅盾研究大體上把握以下幾點：一、始終注意其文學創作與時代、與革命、與國家、民族以及人民命運的結合；二、始終從生活積累、思想積累與形象思維過程的角度考察其藝術構思與創作；三、比較注意其創作與其理論批評的相互印證的比較研究；四、近年來開始從茅盾與文藝思潮之關係的視角作雙向考察：茅盾對文藝思潮的影響及其現實意義，文藝思潮對茅盾的影響及其制約作用；五、注意用教學和寫賞析文章的方式在群眾中普及茅盾。

但是限於水平，囿於時代思潮條件，成果還是粗淺的。因此我給書定題時，就採用《茅盾作品淺論》、《茅盾散文欣賞》等命名；非故作謙，蓋為求實。即便本文與本書，雖冒冒然略抒己見，也難免粗淺之嫌。之所以斗膽饒舌，也旨在求教。願海內外同行學者與廣大讀者不吝賜教，不勝翹首盼望之至！

丁爾綱
1993 年 10 月



目

次

上 冊

我的茅盾研究觀——代序	1
第一編 生活道路論	1
絢爛曲折的政治道路	3
作家與理論批評家的完美結合	31
第二編 理論批評論	59
從經驗到理論	61
茅盾的神話觀	83
茅盾的魯迅觀	101
茅盾的丁玲觀	125
第三編 主題人物論	137
知識分子的人物畫廊	139
——論茅盾小說的主題的連續性與人物的系列性特徵	
資產階級的人物畫廊	167
——再論茅盾小說的主題連續性與人物系列性特徵	

農民階級的人物畫廊	185
——三論茅盾小說的主題連續性與人物系列性 特徵	
下 冊	
第四編 典型提煉論	199
源於生活 高於生活	201
——論茅盾小說的典型提煉	
時代典型的雕塑 現實主義的功力	221
——再論茅盾小說的典型提煉	
把「左拉方式」和「托爾斯泰方式」結合起來	235
——三論茅盾小說的典型提煉	
時代性、社會性、史詩性的追求	249
——四論茅盾小說的典型提煉	
茅盾的《虹》和「易卜生命題」	269
——五論茅盾小說的典型提煉	
第五編 結構藝術論	299
布局謀篇的宏觀思想	301
——論茅盾小說的結構藝術	
恢宏多姿的錦繡園林	313
——再論茅盾小說的結構藝術	
現實主義的總體設計	365
——三論茅盾小說的結構藝術	
附：茅盾部分小說結構圖	380
第六編 茅盾研究論	383
藝術探索與政治偏見間的徘徊傾斜	385
——評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茅盾專章	
撥開雲遮霧罩 恢復廬山真貌	403
——評近些年茅盾研究中的某些觀點	
後 記	427

第一編 生活道路論

絢爛曲折的政治道路

(一)

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公認的奠基人是魯迅、茅盾與郭沫若。

魯迅已獲得了公平的評價：五四「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註1〕這是魯迅逝世後第四個年頭的蓋棺論定的結論。郭沫若也有這樣的幸運。1978年他逝世後悼詞中說他是「爲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堅貞不渝的革命家。」是「繼魯迅之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我國文化戰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註2〕

表面看來，茅盾比魯迅和郭沫若還要幸運。在他生前即五十歲壽辰的1945年〔註3〕重慶文藝界爲他慶壽時，黨中央領導同志就第一次作出了對他的崇高評價。當時離毛澤東同志寫作《新民主主義論》的時間只有五年零五個月，其時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正在延安舉行。那時「左」傾思潮雖已時起時伏，但還不像解放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那麼嚴重。人們評價歷史人物尚能保持實事求是的冷靜、客觀的態度。這種歷史的冷靜與客觀，十分珍貴地反映在王若飛同志題爲《中國文化界的光榮，中國知識分子的光榮——祝茅盾先生

〔註1〕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註2〕鄧小平：《在郭沫若同志追悼會上致的悼詞》。

〔註3〕茅盾生於公曆1896年7月4日。重慶文藝界是按虛歲計算，把1945年5月25日作爲茅盾的誕辰。

五十壽日》的講話，和由廖沫沙同志起草，由周恩來、王若飛等中央領導同志修改審定的重慶《新華日報》題為《中國文藝工作者的路程》的社論裏。王若飛的講話對茅盾所作的評價是：「中國文化界的一位巨人，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文壇上努力了將近二十五年的開拓者和領導者。」「他所走的方向」是「為中國民族解放與中國人民大眾解放服務的方向，是一切中國優秀的知識分子應走的方向。」經周恩來同志修改審定的重慶《新華日報》社論的評價是：「為民族，為人民，為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自由解放」辛勤工作了二十五年的新文化運動中「一位彌久彌堅，永遠年青，永遠前進的主將」，是一面「光輝的旗子。」

把這些評價總括分析，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都是從中國現代革命史、中國現代文化史和中國現代文學史著眼作宏觀歷史評價，並認為三位歷史巨人都是「旗子」，都是「主將」，都代表了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新文化的總方向。而茅盾不同於魯迅與郭沫若的是：僅以其半生貢獻在活著時就獲得了略遜於魯迅，但可與郭沫若的蓋棺論定評價相比肩的評價。自 1945 年到茅盾逝世的 1981 年止，茅盾又為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事業奮戰了三十六年，就時間論，比他自 1916 年入商務印書館到 1945 年的二十九年歷程多七年之久；就貢獻論，後三十六年較之前二十九年，其革命史、文化史、文學史成就也不遜色。隨著中國歷史三十六年的驚天動地的流逝，茅盾高歌奮進，戰功累累。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但所得的蓋棺論定的評價卻大大低於上述 1945 年的評價。這顯然是不公平的。

這就難怪在茅盾生前多次攻訐過他的周揚同志也感到太不公平。他在茅盾逝世兩周年舉行的全國茅盾首屆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中說：「茅盾同志是新文學運動的創始人之一，是現實主義流派的重要開拓者，是新中國文化事業的領導人之一。在文學事業上，他的貢獻是眾所周知的，他的成就是不朽的。對於這些成就，至今還沒有作出全面的評價。」周揚同志接著作了自我批評：「我和他長期在一起工作過，但是我深深感覺到，對他的認識還是不夠的。不但對魯迅的認識不夠，對茅盾的認識也是不夠的。儘管天天在一起，有一段……毗鄰而居，但是我也不能很深地認識他。……一直到他去世的時候，也不能說我完全認識了他。所以認識一個人，特別是認識一個偉大的作家，也並不那麼容易，這需要時間。」〔註 4〕

〔註 4〕《茅盾研究叢刊》1983 年第 1 輯。

這些話令人感動！在當前，最難得的可貴品質之一就是自我批評精神！作爲文藝界的前輩，周揚同志近年來的文學反思，常常帶著自我解剖和自我批評的性質。這博得廣泛的尊敬。他這段話很難得地提出了一個哲理性的問題：「認識一個人，特別是認識一個偉大的作家，也並不那麼容易」；此外他還提出一個意味深長的解決問題的條件：「這需要時間」。這真是一針見血的確論。我們應該無條件地確認周揚的這些觀點與方法，時不我待地努力完成這件帶歷史使命性的任務。

從 20 年代到茅盾逝世，茅盾研究的範圍儘管不斷擴大，但其經歷卻曲折複雜。雖然我們取得了許多成績，特別是解放後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和茅盾的成就、他所涉及的思想政治文化藝術許多領域的恢宏建樹相比，我們的視角還過於狹窄，我們的研究格局也過於狹小！他在許多方面所作的貢獻，有些甚至是啓蒙性、先驅性的貢獻，或者被同代人遺忘了，或者被忽視了，或者竟被有意地迴避了，甚至故意地掩蓋了！而我們這一代研究者只是茅盾後期活動的見證人，比我們年青的一代研究者則和我們仰視茅盾解放前的建樹同樣，只能憑有限的書面材料，和訪問記憶力已明顯衰退，事實又明顯地經過主客觀條件過濾了的被訪問者所作的局限性很大的口述和追憶。加之，恕我直言，年青一代研究者中很有些人對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持有偏見，這和「左」傾思潮導致的我們以及我們的前輩中某些人的偏見，是同一種片面性的兩個「極端」，很難說這些因素的存在，有利於茅盾的研究和認識、評價茅盾工作的開展。加之我們該做的事也太多了。所以，至今茅盾研究許多領域尚待開拓（註 5），重新評價茅盾離不開這開拓性工作的成果。因此，僅就這個意義上說，也是「需要時間」的。

其實我們無法迴避這些問題：茅盾究竟是不是中國現代史上偉大的思想家，算不算中共黨史上偉大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和魯迅、郭沫若一樣，可稱之爲中國現代文化史與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並列無愧的「三面紅旗」？回答這些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我認爲在於對茅盾如何作政治評價。而打開這一局面的契機之一，是面對茅盾在建黨前後的思想與活動，如何實事求是地承認歷史，如何認真估計他在歷史轉折關頭政治道路的那段曲折。如何按照歷史特定條件加以辨析。我們還必須改變過去那種比較零散、比較狹窄的觀察視角，而從宏觀性、綜合性、系統性、全局性

〔註 5〕關於這些，我在《茅盾研究的突破問題芻議》一文中曾略有陳述，可參看。

加以把握，把茅盾研究工作放在更廣闊的革命歷史與文化源流的開闊場景中作整體性和多學科性的研究，並且放到中外文化交流、古今文化承傳的歷史長河中作廣泛探究。只有這樣，才能認清：茅盾確實是「文學家與革命家的完美結合。」

（二）

茅盾生活在由風雲變幻的中國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向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歷史新階段發展的好幾個歷史時期，經歷了三種性質不同的歷史階段。這種歷史的幸運，使他既能與立志改革中國社會、全力叱吒時代風雲的同輩政治家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毛澤東、周恩來等一起從事政治啓蒙運動與創建及發展中國共產黨；又使他能與終生致力於以文藝服務於人民解放、服務於社會改革的同輩文學家魯迅、郭沫若、葉聖陶等一起，為中國「五四」新文化與新文學破土奠基，澆花育苗。他和這些站在不同戰線，同居時代前沿的偉大歷史人物一起，既應時代而生，成為時勢所造的英雄；又依歷史客觀規律而動，充分發揮改造社會、創造歷史的能動作用；和人民一起走開拓古往今來多少仁人志士、「風流人物」心嚮往之的理想的時勢。這種歷史的幸運和他個人獨特的文學機緣、文學素質，又使他能為歷史捉筆，譜寫時代的華章，以作社會歷史發展的見證。

茅盾儘管初入社會就偶登文壇，但他更大的志向在於政治，在於改造社會，為人民謀求解放之途。所以他的文學活動歷來同所從事的政治革命相統一，他的創作歷來以大規模反映時代趨勢、歷史動向與社會發展為基本追求，並且成為其文學素質、創作個性的基本特徵，道理也就在這裡。而且其原始動因與其說是文藝的，勿寧說是政治的和社會的。他一開始就把自己的命運、自己的文藝事業和國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人民的生死命運緊緊連結在一起。

1920 年以前，他還不曾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洗禮，他的社會政治觀，還是革命民主主義的。他和魯迅一樣，一開始就把改造中國社會的歷史重任和希望，寄託在青年一代的身上。

早在 1917 年下半年，他自己還僅二十一歲，他就寫了一篇論述青年學生社會歷史職責的政治論文：《學生與社會》〔註 6〕。這篇文章與 1917 年改版後

〔註 6〕刊於 1917 年 12 月號《學生雜誌》上。